

文艺理論专业
文艺上的反对現代修正主义
和党的文艺方針政策
学习参考材料

(二)

(内部資料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語言文学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說 明

为了配合五九、六〇班文艺理論专业學習“文艺上的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和党的文艺方針政策”，我們編印了这份材料，仅供参考。

語言文学教研室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艺术家对人民的責任	伊利切夫(1)
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是苏联文学艺术的伟大力量!	赫魯晓夫(15)
赫魯曉夫讲话(內容提要)	(64)
伊利切夫报告(內容提要)	(76)
关于苏联青年詩人叶夫杜申科	(85)
叶夫杜申科的反斯大林的詩: «斯大林的继承者們»	(88)
关于索尔仁尼津的小說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93)
特瓦尔朵夫斯基的“代序”(全文)	(93)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故事梗概	(95)
苏联国内外的反应	(111)
丘赫萊依污蔑我电影是“教条主义的和反艺术的思想方法的 范例”.....	(114)

关于艺术家对人民的責任

——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同文艺工作者会见会上的讲话

伊利切夫

同志們！我們又聚在一起，繼續就文艺問題交換意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举行座談的內容丰富，很有意思，因此赫魯曉夫建議繼續座談。我們原打算新年后繼續举行。但是情况有所变化，時間也就比我們預料的拖得长了。

不过，常言說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在这段期間，情况有所发展，因此，实际上也等于在开会。差不多三个月来，我們就苏联艺术发展中的一些最尖銳的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由于党和政府领导人參觀馬涅日的画展以及十二月十七日交換意見所引起的爭論已經越出了各創作协会的內部，扩大了范围，实际上变成了全民的討論。

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爭論涉及到的是与人民有切身关系，是苏維埃人所深切关注的一些問題，是艺术創作发展道路的問題，是为誰的利益服务以及树立怎样的理想的問題。

总之，涉及的是艺术家对人民的責任問題。

我們都是为人民生活，为人民工作。因此苏联人們如何理解党对苏联艺术、对我們文学今后发展的关怀这一点，对我們說來，最关重要。

群众的意見，也正如我們所料，是相当一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會議以及报刊編輯部收到大批的信件、电报、文章、評論和感想。作者有工人、农庄庄員、学者、工程师、画家、作家、大学生，他們表示贊成，并且热烈支持党为爭取苏联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为它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性以及高度的艺术性所作的斗争。

若是在这里宣讀一封一封的来信当然很有意思，場面一定非常感动人，但是这样做花的时间太多。

不过有几封信还是有必要提一提。

我要向你們提一提《共青真理报》所发表的Ф·包格丹諾夫斯基、Ю·加加林、Г·拉莫契金、В·皮特里舍娃以及其他人所写的信。这些同志明确地表示反对某些画家、詩人和作曲家追求形式主义的倾向。他們在信中提到有些人为了追求廉价的荣誉，有时在空洞的漂亮辞句的掩飾下，偷偷地把一些由毫无意义的顏色与声音組成的东西塞进展览会，放到太空里去，并且企图把自己的作品說成是“革新”。信上除了嘲諷这批冒牌的革新者抓住一小撮沙龙里的青年，說：“青年拥护我們”之外，并且宣称：

“不，苏联青年过去和未来将永远反对在革新幌子下的冒牌貨，反对宣扬毫无意义的东西和个人主义，反对妨碍年輕人了解生活，树立坚强的生活信念，正确地估价过去的事實和現象”。

年輕的共产主义建設者們的激动言詞，不能不使那些准备把伟大艺术的利益变換成形式主义的噱头、拙劣的抽象派繪画、淒涼的吉他伴奏下的頹废歪詩的人們的灵魂震动。

尽管有些艺术家蔑視“普通人”的“外行”意見，劳动人民对艺术的現状还是提出了非常成熟的見解。他們十分正确地強調指出，追求形式主义的傾向，完全不像某些人企图証明的那样毫无害处，这种傾向是丧失一切原則性：包括思想艺术的原則和政治原則。

我要引卢加省一位教員維·柯瓦尔来信中的一段話。

“使我們感到惊异的是有些資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嗅覺比我們某些文艺工作者还要敏锐得多”。資产阶级艺术家向来懂得他們是为誰服务，他們絕不采用其他阶级的思想作为武器。我們却有这样一些人干这种勾当，还打着什么“革新”的幌子。如果这是革新，那么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弃又該称作什么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不是杜撰，也不是发明，”柯瓦尔同志接着写道。“这是生活本身，是已經實現的思想生活所产生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有另外的名称，但它只能是創造新社会的工具。”

这是多么中肯，多么聪明的見解！

苏联讀者和观众原来并不像某些文艺工作者想像的那么“简单”。他們不主张无个性的、超时代的、超阶级的“一般真理”，而主张苏維埃的、共产主义的真理。他不懂，也不会接受“不加什么形容詞的现实主义”这种值得怀疑的理論，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才能表現他的世界觀和他那崇高的公民責任感。

苏維埃人是热爱并且懂得艺术的，他們能够清楚地分辨什么是真正的艺术珍品，什么是矯揉造作的假貨，不管这些假貨自我宣传得多么起劲。

当形式主义者、抽象派企图窃据“热爱真理的人”、“真理探索

者”、“革新者”、“美好事物的唯一保卫者”等等头衔的时候，他們这种举动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自命不凡，是企图把不属于他們的，別人的成就窃为己有。

“算啦，”苏联人对他們說，“你們那种自命不凡的抱負太过分，太不自量力了；你們是企图窃取不属于你們的东西。只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使生活更新的艺术，才有权利称为真正革新的艺术，它是世界的真正真实的藝術的体现。”

在創作团体内外展开的討論，表明了我們整个文艺知識界思想上的成熟。特別重要的是，在党的健康化的思想影响下，創作討論的气氛改善了。某些文艺工作者不再有“无人保护”的感覺，人們理直气壮地談論着艺术的党性和人民性，談論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必再怕当作守旧者和保守者了。

一切都上了轨道。

苏联美术家协会主席，苏联繪画大师格拉西莫夫领导下召开的美协書記处扩大会議的参加者，充分理解并拥护党的指示，尖銳譴責企图在我們的艺术中散布个人主义无政府状态的人。在書記处的決議中指責了評選莫斯科美术家作品展覽会上的作品时所犯的严重錯誤：在各个展覽厅里很少，甚至根本沒有展出許多卓越的现实主义画家，如阿·叶·阿尔希波夫、尼·阿·卡薩特津、莫·維·涅斯杰罗夫、康·弗·尤昂、伊·艾·格拉巴尔、維·康·比亚雷尼茨基—比卢里以及其他許多画家的作品，相反地却大量展出了二十年代形式主义的作品以及一部分現代青年画家的作品。

在苏联美术研究院公开的党的會議上，在俄罗斯美协的會議上以及报刊发表的文章里，有許多美术家发表意見，完全支持党在艺术問題上的列宁主义路綫。

在苏联作家协会書記处的會議上举行了大規模的創作討論。

受人尊敬的著名的苏联文学工作者认为党同文学創作中不良傾向所作的斗争，是表达了千千万万苏联人的要求。他們怀着深切的忧虑談到某些苏联作家与詩人作品中的形式主义以及模仿資产阶级文学的“时髦風尚”的事实。我們的一位优秀作家費定說得很对：“党就像在我們面前揭露敌人”。“对我这样一个老作家來說，这个敌人并不陌生。我們远在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进行斗争的时候，就已經同他們相遇了。”

創作問題以及艺术作品的思想性問題在青年作家、美术家、作曲家、电影戏剧工作者、批評家們参加的苏共中央意識形态委员会召开的會議上进行了专门的探討。

会上互相交换意見对各方面都很有益处，而且很坦率。首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实是：我們大多数青年文艺工作者認識到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的真正价值，并明确表示对它们的反感。犯了錯誤的青年詩人、画家、雕塑家冷靜地考虑了对他们的批評，衷心地感到党的恳切关怀，对自己的錯誤也有了正确的认识。首先應該提到涅伊茲維斯特納、別留金和叶夫杜申科。

青年画家瓦斯涅佐夫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严肃、誠恳的态度，愿意認識自己創作錯誤的根源的努力博得了大家的好感。瓦斯涅佐夫和其他的同志們力求不仅用語言同时用行动来回答批評，并且已經开始着手完成新的創作构思，这样很好。我們期待着他們在艺术上有真正的新的創造。

国外进步人士对我们党的宗旨所抱的正确态度不能不令我們感到高兴。譬如古巴的一位卓越的文化活动家黃·馬林涅里奧就这样写道：“……抽象派艺术归根結底来自露骨的反动思想与趣味，要像在苏联所作的那样，向它展开斗争”。意大利的《国家晚报》在談到赫魯晓夫在画展上的談話时写道，这仿佛是一种苏联人民反对艺术中

的怪現象的“本質的表現，是表示抗議的一種新論點。”該報指出抽象派如今在西方“說得客氣些也是令人費解的”，至于蘇聯的追隨者們如果自以為他們的作品在西方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就錯了。

顯然，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形式主義者與抽象派不僅在我們這里，就是在西方的同行們中間也沒有任何“威信”。

二

但是還有另外的意見，其中包括所謂批評形式主義和抽象主義是否會導致創作停滯、是否會壓制藝術上革新的探索，是否會造成對自然主義、照相主義的肯定與鼓勵等種種顧慮。

不用多說，這種顧慮都是毫無根據的。

人民美術家普拉斯托夫在《文學報》上發表的文章里說得很形象，很正確：

“現在可以聽到這樣一些說法，譬如說什麼我們現在要把蝗蟲從地里趕跑，可是會不會钻出什麼白嘴鴉來頂替蝗蟲呢。有些人在斯大林時代從來沒有享過福，而現在居然也從他最近幾年的麻木狀態蘇醒過來，開始用懷疑的態度到處亂嗅了。對於類似的情況我們應該說些什麼呢？只有一個回答，那就是這種顧慮完全沒有現實的根據。應該了解並且相信我們已經永遠確定了列寧的方針，以赫魯曉夫為首的党中央委員會就是保證。”（掌聲）

任何沒有偏見的人都懂得，對形式主義和抽象主義的批評，並不是對自然主義的大赦。不，我們對於平淡無味、沒有創造性的自然主義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但是必須防止有人企圖借反自然主義打擊現實主義美術家，正如同指責在現實主義藝術中探求新形式的人犯形式主義一樣。要知道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本性就在於探求藝術

上美的、生活上正确的并且从共产主义世界觀的立場上予以認識的新事物。

我們可以預料到反動資產階級在苏联反击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抽象派以及其他錯誤傾向的时候，一定会又一次暴跳如雷。事實正是如此。

我們的思想敌人什么話沒有罵过啊！

果然他們大談什么“危机”和“死胡同”，似乎苏联艺术已經陷入“危机”和“死胡同”；他們預言社会主义現實主义的“破产”。他們說什么青年一代作家将起来“叛乱”，反对似乎在个人迷信年代“玷辱了自己名誉”的“父輩”等等胡話；他們杜撰出一套什么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体系与創作自由水火不相容的无稽之談。因此敌人会教訓我們說，如果你們想在艺术中坚持社会主义現實主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斯大林时代”的作法上去。一句話，他們要我們抛弃社会主义現實主义艺术。

这真是天大的愚蠢，为阶级所决定的盲目！

我們的敌人用“冻结”这样一个新的詞汇来表明苏联艺术狀況的特点。他們还使用了一个反义的詞汇“解冻”，这是一个双关語，在資產阶级报刊上早就出現了。

他們企图把我們創作生活里或多或少与資產阶级对于艺术的概念相抵触的一切都归結到这个新发明的詞汇里。只要批評一下意識形态中存在的坏思想，就是“冻结”！只要一談到苏联文化的革命传统以及伟大成就，又是“冻结”！只要一指責什么人思想不健全，忘記了苏維埃国家的自豪感，或者搬弄資產阶级流行的風气的时候，又大喊“冻结”！甚至只要一提到苏联艺术的最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必須与人民的生活，与爭取共产主义的斗争保持紧密联系的时候，又是“冻结”！

遺憾的是（关于这一点也必須談一談）苏联一些文艺工作者不正确地理解了对艺术創作中的錯誤傾向的尖銳而正确的批評，而且不单沒有理解，同时还繼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錯誤观点。有人甚至企图鼓动別人同意他的观点，对那些听取健康的批評意見的人疏远、冷淡，指責他們“沒有原則性”、“背叛”，对他们进行排斥，却把自己的恶意煽动說成是有“原則性”与“坚定性”的典范。

錯誤观点有各种不同的表現。一部分人至今还想造成一种印象，认为沒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有人錯誤地向苏共中央作了汇报，有人私下安排了參觀展覽，有人把自己的观点“偷偷放进去”等等而已。另外一部分人說我們根本沒有形式主义、抽象派，过去也从来没有过。这些都是虛构，是无的放矢。

不論是这一部分人或是另一部分人对目前发生的事都噴有煩言，而且他們不只是消极地心怀不滿，而是竭力使自己和別人的神經紧张。他們虽然沒有天才，嗓子可是鐵打的，到处大声疾呼，奔走不迭，“斗争”这个，“揭露”那个……可是心灵深处既沒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也沒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掌声）拉素尔·加姆查托夫說得很对，他說我們有文艺巨匠，真正文学艺术的巨匠，不要把他們与那些沽名釣誉的，也就是专门追求个人荣誉的文人混淆起来。

这种人在青年的思想中散布怀疑，讓他們不信任党反对与苏維埃艺术格格不入的傾向的明确的作法，他們企图冒充我們青年的精神“导师”和精神“領袖”。

但是我們的人民和苏联青年过去，現在和将来只有一个精神的領袖，那就是我們伟大的共产党！（掌声）

莫斯科美术家組織中的某些领导人所奉行的路線是不能被认可的。他們中間有人态度很含糊，企图在党的批評和那些作品与观点

受到党的公正指責的人們中間充当緩沖器。

至于莫斯科美协的某些会员，像尼·安德罗諾夫、瑪·涅菲多夫、伊·維尔柯維爾、阿·加斯杰夫这样的画家和艺术理論家根本站在不正确的战斗崗位上，可以說，他們現在还是一窍不通，不学无术。总之，首都的美术家組織本来應該成为艺术思想原則性的典范，此刻却仍旧热衷于一些单独的、不负責任的恶意煽动。

在郑重討論某些严肃問題的时候，听不到某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反应。老实說，他們这样“避而不談”是想跟什么人作对呢？跟党，跟人民？在我們相当一部分作家当中，难道不是存在这样一种情緒，认为在某段时期内，还是不写、不作、不創作为好么？

这是与作为一个苏联人毫不相称的中間立場。譬如說一位作家长期写一部作品，把自己的智慧与精力都投入这项工作，像一位作家形象的說法那样，一直工作到手心出汗，这样的作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一位作家长期沉默，那就令人莫名其妙了。

要知道沉默也意味着什么，也反映出某种觀点。

三

直到現在，我談到的主要还是关于青年一代。

但是，苏联文化界极为著名的人士有时也坚持一种令人难以同意的立場。你們大家当然还记得爱倫堡上一次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他提出了几条带总结性的論点。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論点。他的主要意思是对艺术的趣味是无可爭論的。一个人可以喜欢法列克的作品，另外一个人不喜欢，那就由他去。任何艺术家的作品都同样具有存在的权利。爱倫堡认为，真正革新的作品，永久是有人不喜欢的。

這位可尊敬的發言人贊賞弗·伊·列寧的作法，據他說，列寧不喜歡馬雅可夫斯基的詩，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見，自己的愛好強加在別人身上。發言者顯然還有言外之意，他是所謂話到舌尖留半句，不過我們每個人都能從這裡得出“邏輯的結論”。他似乎是要請我們來作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列寧不願意干預藝術創作的問題，他的藝術觀點不同凡俗之處就是他那巨大的寬容態度以及對於所謂“知識分子自由主義作風”的容忍，這一切現在也不應該干預。

我們不應該認為這種論調是靠得住的。這是逃避歷史的真實，歪曲列寧的觀點。

儘管愛倫堡經常號召在藝術方面要寬容，但是他自己的言行却不是如此。

譬如，他給予形式主義畫家過高的評價（關於這一點美術工作者在《真理報》上發表了正確的批評），但是對於我們的一些偉大的現實主義畫家、巡迴展覽派畫家，以及對列賓的作品卻沒有發現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愛倫堡不承認蘇聯藝術與現實主義傳統有著有機的、牢固的聯繫。他認為二十年代以後蘇聯繪畫藝術發展的特點是“自然主義、繁瑣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傳統的形式、清規戒律、概念化和照相式的公式化的反撲”，他含着嘲諷的意味暗示這時期的蘇維埃繪畫是信奉十六——十七世紀波羅尼學院派的條律。

我們報刊對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長時期內沒有任何評論。當回憶錄里寫到的內容只涉及的是早已過去的日子的時候，許多讀者準備把這部回憶錄看作是一個目擊者的、活生生的客觀的見証。而現在回憶錄說的是不久以前的事件時，作者的主觀主義使人們感到需要戒備。讀者紛紛寫信給報刊編輯部，表示反對愛倫堡的意見，認為作者對蘇聯現實作了片面的描寫，維護了少數人的利益，在一連串事件中簡直歪曲事實真相，進行各種篡改。

來信的讀者許多地方是正確的。

愛倫堡在敘述個人迷信的年代時，提出了所謂“沉默的理論”，彷彿這種理論是當時蘇聯人的行動準則，當然，這也是回憶錄作者自己的行動準則。當時似乎很多人都知道斯大林濫用職權，可是除了“咬緊牙關”活下去之外，他們看不見任何別的出路。人人都盡力保全自己，因為他們相信將來會改變。這種“沉默的理論”曾遭到發表在《消息報》上的葉爾米洛夫的文章的批評。

同志們，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捏造的、不正確的“理論”。

首先，這種“理論”是對熱情建設社會主義和相信斯大林行動正確的蘇聯人的污蔑。根據愛倫堡的意見，可以認為，似乎他們都知道對列寧主義的叛離，只是為了救自己的命而助長了禍害。

黨和人民當時之所以沒有反對斯大林，在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著名決議中有所闡明。因此不需要在這裡重複它。只需要明確地說：共產黨員們，我們的黨從來沒有把沉默作為原則。

這種“沉默的理論”就是對愛倫堡本人來說，也是不对頭的。伊里亞·格里戈羅維奇，您當時也沒有沉默，而是歌頌了，用您的政論才能充分地歌頌了。

您在一九五一年談到斯大林的話難道是沉默麼。您說了下面的話：他“像幫助我們大家一樣，幫助我寫了許多東西，還將幫助我寫我想要寫的東西。”斯大林逝世以後，您為了表達您個人的心情，而不是其他人心意，您把他寫成這樣一個人，他“熱愛人民，了解他們的弱點和力量，了解戰爭中失去兒子的母亲的眼淚，了解礦工和石工的勞動，”“了解千百萬人思想感情，反映了他們的願望，他們對幸福的向往和對和平的渴望”。

我引了您這些話不是為了從為數眾多的人們中間把您挑出來，

根据这些話來加罪于您。我們当时并不是口是心非，曾这样写过，这样說过。我們相信过，并写了。而您原来并不相信，却这样写了！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掌声）

應該說，爱倫堡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并沒受到過限制。例如，在《尼古拉·庫爾波夫的生平与死亡》這部长篇小說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通过庫爾波夫的口讲出詆譭我們的革命，污蔑革命英雄的話。一九二八年在柏林出版的中篇《拉吉克·里泰施王涅茨澎湃的一生》里，他可以隨意地抱着偏見来描写当时的苏联現實。小說中描写了一个来自戈麦尔省的穷裁縫的痛苦与折磨，苏維埃制度竟与一个普通人为敌，而国家也是一个只有騙子才吃得开的国家，任何有生气的思想在这里都会遭到压制，这里由口是心非的人和无賴“执政”，压制誠实的人，不給他生存的可能性。

爱倫堡的这个中篇很早以前就写成了，但是至今还被反共宣传广泛利用。我們沒有听到作者对于这一点表示过自己的态度。

問題并不在于某些部門限制作家的自由，問題在于作家本人怎么想，他爱什么，否定什么。他是在历史面前为“俄罗斯祈祷”，怀疑，不安，呻吟，叹息呢，还是把自己全部才能和志向，如果愿意的話，自己的热血与生命毫无保留地獻給一桩神聖的事业——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下改造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

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将經常遭到旧世界內部吹来的歪風的袭击。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他联系人民，思想上已經武装起来，因此在創作的时候也就感到自由。

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讀者也不能同意作者的其他許多論点。譬如，怎么能同意作者对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所給予的評价呢？爱倫堡这样写道，涅克拉索夫、卡薩凱維奇、格罗斯曼、潘諾娃、別克以及其他等等作家都写出了关于战争年代的优秀

作品。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作家中的确有些人创作了与他们所描写的事件很相称的好作品。但是这里的挑选显然是有倾向性的。爱伦堡“由于健忘的缘故”，而把肖洛霍夫、特瓦尔朵夫斯基、费定、列昂诺夫、西蒙诺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作家的作品列入“其他”之中了。

我再举出一件“避而不谈”的事实。譬如，爱伦堡对梅耶荷尔德作过详尽的介绍。但是他只颂扬了梅耶荷尔德创作中最弱的一面，形式主义的一面，对其他方面则避而不谈。

我以为可以宣读一封信，也就是发表在《新观众》杂志（一九二四年第十八期）上的梅耶荷尔德致爱伦堡的一封信。在回忆录《人、岁月、生活》里引用了这封信的片断，恰恰只引了片断。

“我不懂，”梅耶荷尔德致爱伦堡的信上写道，“您根据什么要求我‘放弃演出’波德格列茨基同志的剧本？是根据我们在柏林那次谈话么？可是那次谈话中也谈得相当明确，您说过如果您把您的长篇小说《欧洲复灭史》改编成剧本的话，您也会使这个剧本在协约国的任何城市都可以上演。”爱伦堡就引到这里为止。“……但是，”梅耶荷尔德继续写道，而且这正是这封信里最重要的地方，“我的剧院现在和将来都只是为革命服务……”正是因为这个才恢复了梅耶荷尔德的名誉（掌声），“……我们需要有倾向的、只有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个目的的剧本。我要提醒：您已坚决地拒绝执行共产主义的倾向，指出您对社会革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指出您固有的悲观主义……”

一个粉饰自己个人生活历史的人，未必能坚定有力地来反对粉饰现实。

*

*

*

同志们！上边谈到的这些就是想简单地介绍党和政府领导人

參觀馬涅日展覽之后与十二月十七日接見文艺工作者之間的这段期間有关文艺問題討論的情况。

在上一次接見的时候，爱倫堡的发言引起了特別的重視。因此我不得不詳細地談談他的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伊里亞·格利戈羅維奇是一位大作家，大政論家，是著名的社会活動家、爭取和平的积极战士。我們都記住并很高地評價过他的許多言論，特别是在卫国战争期間。但是如果談到像意識形态等重要的問題时，就不能不对他提出批評性的意見。談到艺术思想性的問題，只能是原則性的，党性很强的問題。

我想重复一句，我們苏联文学艺术的情况是完全健康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党正确的关切的声音已經深入到文艺工作者們的心灵，促使他們考虑艺术創作上最重要的任务，使他們在爭取共产主义斗争中增加了新的力量。（掌声）

（原載1963年3月9日苏联《真理报》）